

文博苑

2025年12月31日，在海南省博物馆2号展厅内，一场以纹饰为语言的文化盛宴“祥瑞万象—— 一纹一世界的中华文化”展览正式启幕。该展以百余件馆藏珍品为依托，通过纹饰这一微小却深邃的文化符号，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千年智慧与海南岛的地域特色，为观众开启了一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视觉与精神之旅。此次展览将持续半年之久。

纹饰会说话 图腾赋美意 纹启祥瑞耀琼州

■ 方波



明代青花云鹤纹瓷盒。



新石器时代彩绘蛙纹双系盆。

中华先民对祥禽瑞兽的崇拜，深刻烙印着原始自然崇拜的印记。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鱼纹、蛙纹、鸟纹等动物形象已不仅是生活的写照，更是生命繁衍、宇宙力量的象征。商周青铜时代，纹饰走向神圣化与威仪化，狰狞威严的饕餮纹、神秘莫测的夔龙纹、盘曲有力的蟠螭纹，成为沟通天地、彰显王权神授的核心符号，这些纹饰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昭示着不可侵犯的神权与秩序。

中国古代祥瑞文化将自然物象与政治伦理交织，形成独特的符号体系，其整合了驱祟、延寿、聚财三重功能，展现了儒释道文化融合共生的特性，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龙，象征皇权与宇宙威力；凤，代表尊贵与逆境重生；麒麟，仁兽化身，兆示太平；狮，驱邪镇宅，护佑安宁；仙鹤，喻示长寿与超然；蝙蝠谐音“福”，象征福泽；马寓“马到成功”之意；梅花鹿象征“禄位”；喜鹊寓意“喜庆”，这些以谐音、图腾为核心的祥瑞符号，将自然物象与人文诉求紧密结合，凝练为中华民族祈福纳吉的视觉图系，这种符号化表达深刻影响了器物装饰、建筑营造乃至文学创作，形成跨越历史时代的文化共识。

蛙纹 生命与繁衍的象征

蛙纹作为中国纹样体系中最具原始生命力的符号之一，其文化意蕴的形成与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自然崇拜密切相关。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上，蛙纹已以写实与抽象结合的形态出现，其夸张的四肢造型与圆形躯干构成的生命张力，直观映射了原始先民对两栖生物繁衍能力的崇拜与敬畏。考古研究表明，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内壁常绘有成对的蛙纹，这种对称布局不仅体现了原始先民的平衡美学意识，更暗示着先民对生命循环与阴阳平衡理念的原始认知。在农耕文明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蛙类与水土环境的共生关系，使其被赋予了沟通天地、调和风雨的神秘职能，这种认知在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中亦可窥见端倪，但蛙纹以更直观的生物形态成为原始生殖崇拜的具象载体。

蛙类的繁殖特性在文化符号系统中被解构为多重象征：雌蛙每次产卵可达数千枚，其旺盛的生命力在物资匮乏的原始社会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仰韶文化的鱼蛙纹组合图案显示，先民将蛙与鱼类共同构建构图，通过水生生物的共生关系隐喻丰饶的水域生态，这种生态隐喻在马家窑文化涡纹演变中进一步抽象化为水波意象。

值得注意的是，蛙的产卵周期与月相变化存在隐秘关联，这使得蛙纹在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琮等礼器上常与太阳纹、星象纹共存，形成天象观测与生命节律相融合的符号系统。这种多维度象征性在商周青铜器中的蛙形觥、蛙形尊中得以延续，其器物造型刻意强化蛙的鼓腹形态，既是对生殖崇拜的延续，也暗含对社稷丰收的祈愿。

龙纹 皇权与吉祥的化身

龙纹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祥瑞符号，其文化意蕴贯穿了三千余年的文明发展脉络。早在商周时期，龙纹便以神秘图腾的形式出现在青铜器与玉器之上，多以抽象几何线条勾勒，却蕴含着沟通天地的原始信仰，与后世逐渐形成的祥瑞象征体系一脉相承。至秦汉时期，随着礼制体系的完善，龙纹的造型开始向具象化发展，线条流转间呈现出灵动飘逸的特征，标志着龙作为皇权象征的含义逐渐清晰。汉代画像石中腾跃的游龙与瓦当上的蟠龙纹样，均展现出对帝王权威的具象化表达。

唐宋时期的龙纹艺术实现了美学与哲学的双重突破。唐代龙纹在金银器、织锦等载体中以丰满雄健的体态彰显盛世气象；宋代龙纹则趋于典雅含蓄，瓷器上的龙纹常与云雷纹交织，象征风雨调和的祥瑞愿景。此时龙纹不仅承载皇权象征，更与民间祈雨、祈福习俗深度融合，其纹样设计开始注重吉祥寓意的视觉化表达。

明清时期，龙纹的皇权属性达到极致。明代宫廷颁布的《大明会典》明确规定龙纹五爪为皇室专属，而清代更以《皇朝礼器图式》严格规范龙纹使用，其形制从须发数量到鳞片排列皆成为等级制度的象征符号。在文化解读层面，龙纹始终是中国传统祥瑞观念的核心载体，其蜷曲蜿蜒的形态象征阴阳流转，以怒目张口的姿态展现雷电威严，而鳞片与云水的组合则寄寓风调雨顺的祈愿。

凤纹 尊贵、吉祥与重生的化身

凤凰作为“羽虫之长”的神话形象，在先秦文献中已确立“见则天下安宁”的祥瑞象征。汉代织锦纹样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上的动物图案展现了早期凤纹的形态多样性，学者们对其中鸾鸟、天龙等形象的辨识存在不同观点，如于志勇先生认为应为孔雀与龙，这种多元解读正体现了凤纹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壁画墓中的吉祥鸟兽纹饰突破了汉代五色体系的限制，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色彩斑斓的仪仗壁画，其以红黄蓝白绿五色交织的凤凰形象，既延续了传统祥瑞寓意，又通过突破性色彩搭配构建了当时的视觉表达方式。

唐代以后，凤纹的程式化特征愈发显著，其与牡丹、缠枝等花卉纹的结合形成“凤穿牡丹”经典构图，如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鸾衔绶纹银壶，其纹饰布局中凤凰与鸾鸟交颈共舞，绶带缠绕的造型，通过花鸟互动的动态构图实现“图必有意”的祥瑞美学。这类纹样在宋元时期进一步演变为“百鸟朝凤”的主题装饰，暗喻皇权与天道的和谐共生。

明清时期，凤纹的符号功能发生重要转变，在婚庆主题中，“龙凤呈祥”主题纹样成为礼器与服饰的标配，如海南省博物馆此次展出的一件清代粉彩龙凤纹瓷罐，其粉彩装饰工艺下的龙凤相逐图案，以对称式布局强化阴阳和合的寓意。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凤纹已突破单纯的神兽形象，常与云纹、火珠等元素组合，如清代缙丝婚服上的“凤凰于飞”纹样，通过云气卷曲的动势与火珠象征的太阳意象，构建出立体化的吉祥叙事空间，这种纹饰语言的革新不仅服务于皇室婚庆，更通过江南织造业的传播成为民间婚俗的重要符号载体。

马纹 功业与进取的图腾

马纹作为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发展与纹饰变迁始终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先秦时期，马作为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运输工具，其形象已出现在青铜器与玉器的装饰中，但多以具象形态呈现，随着周代礼制的完善，马车成为贵族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马纹逐渐摆脱单纯的写实风格，开始向程式化、符号化的方向演进。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与漆器上，马纹常与车马出行图结合，通过细腻的线条与夸张的动态姿态，既展现贵族出行的威仪，又包含“君子藏器于身”的道德寓意。

汉代是马纹发展的重要转折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骑兵作战体系的成熟，马的社会功能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汉代画像石与帛画中的车马纹饰，以“列肆”“车骑”等主题为核心，通过层叠构图与简练的阴刻线条，将现实中的仪仗场景转化为永恒的艺术符号。特别是西汉中晚期墓葬出土的彩绘陶马与铜车马器，其肌肉线条的刻画愈发写实，鞍鞵、轡头装饰的纹样则融入云雷纹、龙纹等祥瑞元素，代表马已超越实用功能，成为沟通世俗与神圣的媒介。

唐代马纹的演变则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质，得益于强盛的国力与开放的政策，波斯、粟特等域外艺术风格深刻影响着马的形象塑造，唐三彩陶马的造型饱满丰腴，釉色流动自然，既延续了北朝以来马匹的膘壮健美特征，又增添了西域马匹的异域气质。织锦中的翼马纹堪称文化融合的典范，其双翼设计融合了佛教飞天意象与道教羽人传说，马首前视的姿态与飘逸的飘带共同构成天马行空的奇幻意境。这种超越现实的装饰手法，不仅满足了贵族阶层追求仙界意象的心理需求，更彰显了唐代“兼容并蓄”的文化自信。

至元明清时期，马纹在工艺载体与审美取向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元代青花瓷器上以马为主题的纹饰，搭配以水墨画般的笔意描绘草原民族逐猎场景，马匹矫健的姿态与芦苇、飞雁等元素共同构建出塞外风情画卷。明代青花瓷器则更注重纹饰的布局与留白，马的形象多融入山水庭院之中，通过疏朗的构图与柔和的青花呈色，传递出文人阶层“人马合一”的隐逸情怀。清代五彩、粉彩与竹刻作品中的马纹，虽沿袭了传统造型，但装饰细节愈发繁复精致，金漆贴饰、透雕镂空等技法的运用，使马纹饰成为彰显工艺极致的载体。

马的象征体系呈现出多维度的文化投射。在政治层面，马被视为权力与秩序的象征载体，商周青铜器上的车马纹饰常与祭祀、征伐场景结合，既体现“服牛乘马”的军事传统，又代表“君子如马”的品行要求。汉代画像砖中奔驰的骏马将军军事力量与国家意志通过纹饰语言凝聚。在伦理层面，马的“忠诚信义”特质被儒家文化吸收，形成“伯乐相马”“千金买骨”等典故，成为贤才举荐与君臣关系的隐喻。《论语》中“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的论述，更将马提升至道德典范的高度，使其纹饰具备了教化功能。

马的文化独特性在于其将自然崇拜与艺术美学熔铸为统一符号系统。从仰韶文化彩陶上的简朴马纹，到唐三彩骏马的富丽华美，始终贯穿着对生命力的礼赞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纵观马纹的千年演变，其形态从早期的实用写实发展为后世的象征艺术，始终承载着社会功能、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的多重表达。在与祥禽瑞兽纹饰的共存体系中，马纹凭借其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关联性，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系统，成为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兼具实用价值与精神寄托的典范。

鹤、狮、鸡等纹饰 美好寓意 兼容并蓄

鹤纹作为长寿与祥瑞的象征，在古代器物装饰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修长优雅的体态与清逸的神韵，常通过工笔画与浮雕技法呈现于陶瓷、织锦等载体之上。如省博此次展出的一对明代青花云鹤纹瓷盒，仙鹤与云气纹交织，展现升仙主题的典型特



明代琉璃建筑构件上的龙图。

征，这类造型既体现了“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文学意象，也承载着古人追求长生的愿景。

狮子作为外来文化符号传入中国始于汉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作为西域贡品及佛教传播的双重路径进入中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狮主要作为陵墓镇守兽出现，其造型受佛教艺术影响；唐代因国力强盛，贡狮频繁，狮子形象逐渐宫廷化与艺术化，与龙、凤、麒麟并称四大祥瑞。宋元以后，其功能从陵墓守护转向宅邸象征，明清时期形成“左雄右雌”的固定制式，雄狮踏球喻示权力，雌狮伴幼狮象征繁衍，体现了古人的阴阳哲学观。在文化寓意层面，佛教赋予其智慧与护法内涵，风水学归为乾卦象征阳刚正气，民间则通过舞狮活动寄托驱邪纳吉的愿景。这一演变过程展现了外来物种经本土化改造后，深度融入中国的权力叙事、宗教体系与民俗实践，最终成为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文化图腾。

麒麟作为“四灵”之一的瑞兽形象，其“麋身龙角”的奇幻造型在汉代画像石与明清漆器上均有体现。麒麟送子、麟吐玉书等题材的流行，既呼应《孔子家语》中“麒麟至则有圣人”的祥瑞观念，又通过“角似龙而头似鹿”的形体特征，将自然生物与神话想象巧妙融合。这类纹饰在回族、苗族银饰与织锦上的表现，往往采用对称布局与连续纹样，其借鉴融合的图案技法与丰富题材，共同构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图腾崇拜的延续。

鸡的吉祥寓意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深厚的学术研究价值。考古研究表明，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们已开始驯养原鸡，殷墟甲骨文中已



东晋青釉鸡首壶。

有祭祀用鸡的记载，西周青铜器上的鸡纹则体现了早期鸡与神圣威严的关联。汉代《韩诗外传》系统提出鸡的“五德”（文、武、勇、仁、信），将其升华为儒家伦理的具象化载体，其中鸡冠象征文德、爪距代表武德、司晨报晓信德，成为士大夫阶层道德教化的视觉符号。在民俗层面，“鸡”与“吉”谐音衍生出“大吉大利”等吉祥寓意，其报晓特性被赋予驱邪功能，《荆楚岁时记》载正月初一贴画鸡以辟邪的习俗延续至今。明清时期鸡纹进一步制度化，清代二品文官锦鸡补子成为权力象征，从甲骨文灵禽到“五德之禽”，从祭祀用品到科举象征，鸡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从神性到德性、从宗教到世俗的演变，成为贯通中华文化与民间信仰的重要图腾符号。

从文化符号的视角看来，祥禽如鹤、鸡等，既象征着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形态，又暗含突破桎梏、蓬勃进取的创造精神；瑞兽如麒麟、马、龙、狮等，则承载着祥瑞兆世、镇守四方的伦理诉求与权力象征。这些文化符号所传递的包容共生理念、进取开拓精神与秩序建构意识，为后世文化品牌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创新空间。

（作者系海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宋代青白釉花鸟凤首盖的壶顶纹饰为凤凰头部。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省博物馆提供